



# 雅俗共赏贯古今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



海南黄花梨半桌。



文海南日报记者 罗安明

## 词话家具

桌椅板凳、床柜架格，细细算来，我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家具的亲密接触中度过的。古往今来，家具深入参与了我们的生活起居，影响了中国的礼仪文化、人文风貌。以至于当我们翻开一本字典，会发现许多汉语词汇与家具渊源颇深。

大约五六千年前，我们的祖先从游牧状态进入农耕时代，开始穴居生活。洞穴内空气潮湿、地面泥泞，为了生活得尽可能舒适，他们用草、树叶、芦苇等编成席子，席地而坐。

久坐身体总会疲累，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，几、榻、床等低矮家具出现，为人的身体提供了新的依凭。榻，本有“塌然接地”之意，其重心离地面较近，方便坐在上面的人起身，也能避免地面潮湿之气对人体的侵害。

秦汉时期，古人起居生活的中心开始从席转移至榻上，榻成为文人雅士招待宾客、聚会娱乐的重要平台。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古画《北齐校书图》，呈现了北齐天保七年（556年）几位士大夫领皇帝命勘校五经的场景，一张榻上坐着四人，吃的、喝的、玩的都在榻上，有人展卷沉思，有人执笔书写，有意欲离席，人物神情生动。

榻的体型比床小，方便移动。《后汉书》记有言：“特设一榻，去而悬之”，古人会将榻悬挂于客厅墙上，以备待客之用。唐代才子王勃的名篇《滕王阁序》提及的“徐孺下陈蕃之榻”的典故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的用榻习惯。

据《世说新语》等资料载，东汉名臣陈仲举（陈蕃）因谏言得罪权贵，被贬为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太守，他刚赴任，就打听当地高洁之士徐稚（徐稚）的住处，想去拜访。下属随从建议他先去官署，陈蕃反问道：“周武王刚刚战胜殷，就连忙到商容居住的里巷去表彰他。我拜访贤人，不按例进官署，有什么不可以吗？”后来，陈蕃多次邀请徐稚到府上做客，取下挂在墙上的榻招待徐稚。徐稚离去后，他又命人把榻挂起来，意思是除了徐稚，别人没有资格用这张榻。

陈蕃为徐稚下榻，体现了他礼贤下士的姿态和对宾客的尊崇。后来，人们用“下榻”一词形容宾客人住，其中也有礼遇尊崇之意。

## 第一把交椅



海南黄花梨书画箱。



文海南日报记者 罗安明

## 词话家具

提到海南的家具历史，黄花梨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。“花榈出安南及海南，用作床几，似紫檀而色赤，性坚好。”唐代陈藏器在《本草拾遗》中称黄花梨为“花榈”。清代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·木语》中提到：“海南文木，有曰花榈者……其节花圆晕如钱，大小相错，坚理密致，价尤重。”可见古人早已认识到海南黄花梨是制作家具的上乘原料。

海南黄花梨不易变形开裂，适宜用于制作榫卯，加上其色调暖黄、有丰富的肌理纹线，天然显出华贵之气，可满足皇家和官宦人家彰显尊贵地位的需求。海南黄花梨生长周期长，加之遭到过度采伐，这种珍贵的木材一直较为匮乏。

“木中皇后——海南黄花梨陈列”展厅的“花梨时代”部分展示了多种海南黄花梨家具，如椅凳类、桌案类、床榻类。海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，海南黄花梨在海南岛西部及西南部海拔400米以下的平原或丘陵地区分布较多，其性耐干旱、耐贫瘠。

明清两代，中国家具制作工艺登峰造极。这一时期，海南黄花梨凭借行云流水般的纹理，及优良的耐用性和可塑性，成为家具制作领域的名贵木材。文人积极参与家具设计，匠人精工细作，将一件件精品黄花梨家具呈现在世人眼前。

而在海南，黄花梨也曾被百姓用于建造居所、制作饮食器皿等。因其木质坚硬，20世纪90年代以前，海南山区的一些农户就地取材，用花梨木制作犁耙。

当然，产地优势并不一定能转换为制作工艺上的优势。周凤姣认为，海南是黄花梨的产地，我省在家具制造方面具有原料方面的优势，海南工匠的制作工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，但在挖掘传承黄花梨文化，打造具有海南风格的家具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■



海南黎族群众编的藤篮。

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大仍村村民米丽珍在展示自编的藤篮。

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摄



我们在海南看到流传下来的老家具，大致有两类，一是制作于明清时期带有广式风格的家具，二是海南本土的琼作家具。”海南黄花梨研究会副会长周凤姣介绍，前者包括常见的太师椅、八仙桌等，多采用手工雕刻，使用榫卯结构，用材多为黄花梨、酸枝等。这类型家具富有观赏性，能体现出家族气势，多为应对重大节日而制，其中有不少是嫁妆。过去海南的大户人家也会专门请广州有名的老师傅来琼制作家具。

历史上的海南本土家具，多为折叠椅、躺椅、圆桌、凳子等，这类家具几乎无固定制式，主要为满足生活需求而制，用料大都为农村地区常见木材，常见于各地农场。

周凤姣介绍，海南民间家具的流传有一个特点，那便是祠堂、庙堂内的供案、供桌保存较为完整。“普通供案一般高1米至1.2米，但我在海南见过一个高1.5米的供案。供案越高，往往房屋也越高大，反映出屋主的实力和眼界。加之该案虽呈现出中式家具的风格，但绘有西洋图案，我们推测屋主是华侨。”周凤姣说。

受益于独特的自然环境，海南竹藤类资源较为丰富，农村房前屋后或山林里，竹子、藤蔓的身影时常可见。就地取材是人们朴素的生活智慧，于是，历史上竹篾器具和藤编器具在海南岛上广为流行，竹筐、竹席、竹椅、藤篓等是老百姓常用的简易家具。

明正德《琼台志》“土产”一卷中记载，当时海南产出盘、盖、箱、桌等藤器。清代《南越笔记》中也有记述：“琼州出红藤簟，其色殷红，莹而不垢。《志》称粤东多藤，产于海南者为最。琼州有赤、黄、白、青诸藤，又有苦藤、圭藤、土藤，皆堪为器用。”

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，海南家具的形态不断变化丰富。海南早期的家具工匠来自天南地北，各个家具制作流派的工艺融汇在一起，形成了具有海南特色的家具特征。进入明清时期，海南的匠人积极学习吸收各地的家具制作技艺，各类家具既有京作家具的气派豪华，也有苏作家具的格调细腻，还有广作家具的庄重大方。

家具是生活实践的产物，折射出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俗。千百年来，生活在海南岛上的人们创造出了许多颇具特色的家具，形成了独特的家具文化。

海南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，木料是黎族人制作家具最易得的材料。黎族人制作木器有较为悠久的历史，过去大多数黎族男性都掌握有一定的家具制作技术，可制作一些简单的木器，包括板凳、桌子、木盆等简易家具。

“独木”是黎族木器最突出的特点，无论器形大与小、结构复杂或简单、功能单一还是多样，黎族人都尽量用一块整木造物。在黎族人的生产、生活、宗教等主要活动中都可以见到独木器具的身影，种类达200余种，包括独木饮食器、独木蒸酒器、独木谷桶、独木舂米臼、独木牛铃、独木凳等。

过去，黎族人居住的船型屋空间狭小，无法摆放太多的家具，而且使用的家具种类也较少。独木凳是黎族最有特色的常用家具之一，由黎族人根据木料原来的形状加工而成，给人以返璞归真之感。20世纪60年代以前，独木凳曾作为乐东黎族女孩的嫁妆。

独木凳一般用高25厘米到40厘米、直径20厘米到30厘米的原木雕凿。黎族人将一块木料的中部掏空，同时留下多条起支撑作用的凳腿，凳腿弯曲呈弧形，美观大方又实用。有一些独木凳的凳面和边沿上还刻有黎族特有的花纹图案。如此费工夫，其实一条独木凳的制作成本不亚于由板材拼接而成的凳子。

海南黎族聚居区大部分位于中部山区，这些地方植被覆盖率高，但空气也较为潮湿。为了避免潮湿的空气给器物、储存的粮食、衣服等带来霉变，黎族人通常使用藤条或竹条编制家具用于收纳物品。例如，以前许多黎族家庭没有衣柜，黎族人就用藤条编制藤篓，用来装衣服。

相较于几、榻、床，椅是中国古典家具中的“小字辈”。我国最早关于椅子的形象出现在敦煌285窟西魏壁画中，不少学者认为，椅子源自于西域传入中国的胡床（马扎），其在中国的普及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流行有关。

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出现了最早关于“椅”字的记载：“其桐其椅，其实离离。”不过此处的“椅”指的不是家具，而是一种树——楸。楸是紫葳科梓属的一个树种，为我国特有优质用材树，在古文中常与梧桐、漆树等名木同时出现。

自古以来，中国人头脑中关于椅子的概念很清晰：能倚靠的坐具。文献中关于家具“椅子”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唐代中晚期，宋代以前，“倚子”这一写法反而比较常见。

进入宋代，桌、椅等高型家具开始盛行，人们告别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，垂足而立成为主流。这一时期，椅子的样式十分丰富，其中交椅最为流行，是达官显贵府中不可缺少的家具。

顾名思义，交椅是一种椅背交叉的椅子，人们很容易从外形上发现它与马扎的相似之处，一般陈设于厅堂供主人和贵宾使用，装饰雕刻较为讲究，有的还配有椅披、皮毛，较为奢华。

广受欢迎的圈背交椅，有软屉、靠背、圆形扶手、踏板，坐起来较舒适，而且方便携带。宋元明时期，皇室成员和大户人家外出巡游、狩猎，经常带着这种椅子。在宋人绘的《春游晚归图》中，可看到一名男子肩上扛着一把圈背交椅。

皇室成员在户外巡游也好，文人士大夫在家中会客也罢，一群人会面，最舒服最奢华的那把椅子肯定要让现场最尊贵的人坐。久而久之，交椅成为权势地位的象征。现在，我们常在各种社交场合听到“某某坐稳了头把交椅”，大致意思为某某在某个领域或某一组织中起主导作用、说了算。

从席上的曲腿而坐，到榻上的相谈甚欢，再到交椅上的正襟危坐，家具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形态，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记忆。当我们在历史的长廊里驻足回望，它们仿佛是一群会说话的老朋友。■